



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

——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

朱 骅◎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朱骅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309-08981-3

I. 美… II. 朱… III. 赛珍珠(1892~1973)-文学研究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5107 号

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

朱 骅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62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981-3/I·689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导师：
林润、杨乃乔、陈思和、Emory Elliott

序言 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 话语与中国学者的 后殖民文化研究

杨乃乔

朱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是林润教授。林润教授是一位在美国获取博士学位并长期在美国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优秀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现代与后现代文学、中英双语的美国华人文学。受林润教授的影响，朱骅把自己定位在后殖民文化及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研究，这一学术方向及其相关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成为他为成就理想而执守的学术领地。当然，这一研究方向的定位也取决于朱骅本人在英语能力上所拥有的优势。

后来林润教授返回美国定居，于是系里决定由王德威教授、陈思和教授及我三人构成指导小组，进一步指导朱骅的博士论文书写。由于学术工作与论文指导的关系，我对朱骅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客观地讲，从人格气质及生存经历两个面向来判断，朱骅的确适合从事人文学术研究。曾几何时，关于“适合从事人文学术研究”是一个获有很高评价性的表述，然而在后数码时代知识与信息合法化的过程中，“人文”这个积淀着一个民族整体智慧的历史话语已经彻底让渡于“技术”的表达。一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 1979)所预言的那样，后现代社会要求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创造的是技术，而不是思想；因此，后现代社会也要求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和研

究机构只培养技术人才,而不是那种有能力领导一个民族走向解放的思想精英,并且要求这种技术人才在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实际职业岗位上合法化地承担一种角色^①。

我私下在想,哪怕这种社会角色在本质上最终蜕变为一个技术官僚,其结果还是可能会导致如下状态的形成:“人文学术研究”被挤压于社会的边缘,沦落为一方生活相对穷困且生存绝对寂寞的空间。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的确提前为自己所从事的人文研究预言了悲怆的未来,然而有趣的是,当后现代工业文明以全球化的姿态席卷世界,他却因为自己在人文研究空间中的执著成为让国际学界瞩目的思想大师。

的确,在中国学界,“人文”绝然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众声喧哗而显得过度灿烂。那个时代的文人都可能有机会佯装一回公共知识分子,摇扯着“人文大旗”,摆出一副第二次启蒙的姿态,为中国的命运讲述着真理什么的;然而在大浪淘沙之后,“人文”却成为少数真正的思想者已然驻守且不可舍弃的领域。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再提及“人文学术研究”,尤其是提及“文学研究”,作为体制内的少数民族群——人文公共知识分子必然要把“课时量”、“文章发表量”、“著作出版量”、“课题申请量”以及“贫困”、“疲惫”、“窘迫”、“意志”、“毅力”等词语组合在一起,以此形成一个综合判断,描述驻留在这方领域中的执著者,尤其是对那些初入这方空间,背负着这种综合判断,正在疲惫跋涉的青年学者来说,这种描述尤为奏效。其实仅就学界而言,关于这种综合判断的言说者与倾听者似乎不少,说得多了及听得多了,也就成为一种庸常的八卦。因为现下是一个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年代。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言说一下来自苏北农村的朱骅。

在我过去所招收的硕士、博士与博士后中,有一部分同学来自偏僻且贫困的农村,正因为他们生存在被后现代高科技社会及其后现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48.

代文明所遗忘的角落,他们在人格气质及生存经历两个面向上却获有不可多得的品质。他们质朴、诚实、自强、坚忍、懂礼貌、吃苦耐劳,并且他们更懂得珍惜机会;较之于那些“富二代”在其父辈为他们囤积的最大资源享用中所呈现的先天性无能,对于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而言,他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线阳光与一点水土的滋养,就可以迅速成长且成才。

我所了解的朱骅就是这样一位青年学者。

在 21 世纪,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必须秉有耐得住贫困与寂寞的坚忍和毅力,而对从小在苏北偏远农村长大的朱骅来说,这些已在他所经历的生活窘境中全部给定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想以“文革”式的忆苦方法来记述朱骅在其青少年时期的苦涩经历,我只想说明,朱骅从苏北农村一路走到复旦大学,闯入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恰恰没有效仿那些庸常之辈在骨子里携带着极端的欲望做着无望的淘金梦,他确实是怀揣着人文理想与文学激情走进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这方空间,希望把国际性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所以,他可以且有资格把这个职业视为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崇高,而绝然不仅是为了截获一纸文凭,最终在上海滩找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企盼过着小资的生活而沾沾自喜。

关于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所以我认为,从人格气质及生存经历两个维度来判断,朱骅的确适合从事人文学术研究,他也无可回避地选择了文学研究。

作为一位青年比较文学研究者,近年来,朱骅一直把“双语的中美跨国书写的系统研究”作为自己执著的研究方向。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上来讲,语际之间的文学与文化的“系统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要在学科理论上关注的阿基米德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中,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设问曾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

究中追寻体系的汇通。”^①朱骅所定位的关于双语的中美跨国书写的系统研究,即是我们所定义的“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的汇通”。需要强调的是,朱骅作为一位比较文学博士,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上是明确的,也是相当自觉的。

就博士论文的书写与指导经验来说,我们都知道,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博士在其一部成功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的书写中,会基于最初的开题报告之上,有序地展开跨语际材料的积累及跨语际阅读的思考,最终把这个课题逻辑地在体系上扩展为他一生所追求的研究方向。朱骅在他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完成之后,从跨语际文献积累、跨语际材料阅读、跨语际思考、论文书写、学位答辩到获取学位后的近几年高校工作,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的体系构成上,扩展着自己关于双语的中美跨国书写的系统研究,并且在学术研究的沉淀上越来越成熟,最终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系统的研究计划。从现下来看,他的研究计划可以界分为四个面向而依次展开。

第一个研究面向关涉到美国来华的各类人员的双语书写。例如传教士、各种专业人员及其家属等留下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字材料,其中比较突出的研究现象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还包括曾经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着较为广泛的读者影响力的诺拉·沃恩(Nora Waln, 1895—1964)、何巴特(Alice T. Hobart, 1882—1967)、项美丽(Emily Hahn, 1905—1997)等女性作家群。

第二个研究面向关涉到美国本土华裔的英文书写。例如上至 19 世纪的水仙花(Sui Sin Far,原名 Edith Maude Eaton, 1865—1914), 20 世纪前期的黄玉雪(Jade Snow Wong, 1922—2006),民权运动后的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赵健秀(Frank Chin, 1940—)、谭恩美(Amy Tan, 1952—)等,她们在美国当代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第三个研究面向关涉到赴美学者和留美学生的英文书写。其代表性作家有林语堂(1895—1976)、黎锦扬(1917—)、蒋彝(1903—

^①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3 页。

1977)、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与闵安琪(1957—)等,不同时代赴美学子有着不同的书写政治和诉求对象,他们的书写传达着不同的中国形象。

第四个研究面向关涉到赴美华人的华文书写,目前学界主要将其作为广义的华语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一部分来研究。虽然赴美华人的华文书写属于当代多语种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影响与名声主要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华语社区,如以白先勇(1937—)、於梨华(1931—)、聂华苓(1925—)与严歌苓(1958—)为代表的数位留学生文学等,他们的中国书写和前述三种英文书写可以构成具有相当张力的对比分析框架。

毕业时,朱骅从自己积累的研究中浓缩出一部45万多字的博士论文:《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确切地讲,他当时是把赛珍珠与何巴特两位来华新教女传教士整合在一个逻辑构架下给予思考与研究的。博士毕业后,朱骅返回大学的教研岗位上,一直就这个课题保持着持续性的思考与书写,这一点非常难得。实际上,在一个更为完满的逻辑构架中,朱骅后来把他的博士论文丰富与扩展到60万字。可以说,目前朱骅对美国来华作家的跨国书写已经给出了相当全面的思考与研究,只是现下的出版社一般不太愿意出版一部60万字以上的大部头著作,因此,为了出版的方便,也基于更合理的逻辑构架,朱骅把赛珍珠与何巴特再度划分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出版,也以此分别细化了他本人对上述两位女传教士之中美跨国书写的独立性与体系性研究,所以,除了此部现下出版的著作《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之外,另外一部关于何巴特及其跨国书写研究的专著也将问世。

这两部著作是朱骅在自己的系统研究计划中所关涉的第一个研究面向,即美国来华的各类人员的双语书写。至于其他三个部分,他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也已经作了较为全面的跨语际文献收集及相关扩展性思考。实际上,一位自律且优秀的青年学者,一定会从他准备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之际,即为自己开始设定未来的学术发展走向。这是学术生存论的一种基本策略。

在这里,我想具体地谈一些在后殖民文化研究平台上关于双语的中美跨国书写研究的学术感受。

这部著作作为朱骅(以下称为“作者”)关于这一课题系统研究的一部分,为后续的可持续性研究设立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构架与研究方法,并且,其具体落实在所研究之文化背景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自洽整合点上。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个案研究从不脱离具有延续性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且,作者又把历史文化语境的独特之处通过个案研究给予接近历史的还原性呈现,以此揭示出在文化语境中隐伏的强大的来自宗主国的霸权力量。

我认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视域,这部著作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学术特色。首先,这是中国汉语学界第一部在比较视域的体系化汇通上关涉美国东方主义的研究著作,这部著作对美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话语”的思考与研究,是依凭一位中国学者的立场与视域所给出的自洽的概括与当下的诠释。其次,就中国汉语学界近30年的相关研究来看,这部著作关于赛珍珠及其跨国书写的研究更为系统与全面,真正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开阔视野与纵深拓展。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时,曾参加过国内汉语学界关于后殖民主义批评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介绍与讨论,随后我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作博士后的科研工作时,也曾应温儒敏教授的邀请(当时他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与毛荣运、刘须明两位教授一起翻译过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 1952)主编的《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1997)一书。后来,尽管我不再于此领域中书写过相关文章,然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一领域学者的思想交锋与学术对话。

在我的相关学术信息的阅读与积累过程中,我一直持有一种学术感觉,即中国汉语学界关于西方后殖民批评、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及东方学的译介、思考与书写,的确经历了一个由汉语译入语字面提取误读意义的过程。

后殖民批评及后殖民理论首先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等来自第三世界的少数族裔学者在美国学界肇始的话语,然后,西方本土的一些学者也追随着上述三位学者,在两种基本绝然悖立的价值取向上讲唱着什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术语——“后殖民文化研究”,用这个术语给后殖民批评、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与东方学等一个总括性的指称;如果我们把西方出版的关于后殖民文化研究讨论的读本一路地阅读下来,除去早期这些读本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视域方面的启示之外,后来的关于后殖民文化研究的读本与文章也不见得比中国汉语学者写得更好且更有真知灼见。说白了,西方学界也在准抄袭的重复上生产学术垃圾。

赛义德的《东方学: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1980)在西方学界浮出水面后,不少西方学者曾试图在其研究的论点上归纳美国东方主义的特点,如苏勒(Malini Johar Schueller, 1957—)的《美国的东方主义类型: 1790—1890年文学中的种族、国家和性别》(*U. S. Orientalisms: Race, Nation, and Gender in Literature, 1790-1890*, 2001)、麻理吉原(Mari Yoshihara, 1968—)的《拥抱东方: 白人女性和美国的东方主义》(*Embracing the East: White Wome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2003)、克莱恩(Christina Klein, 1963—)的《冷战东方主义: 中产阶级想象中的亚洲, 1945—1961》(*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2003)等。这几部读本都是建基于赛义德的论点之上所给出的递进性思考及有益补充,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关键词的方式单列章节来概述美国东方主义的特点,只是笼而统之地慑服于赛义德的观点之下,再度给出自己的理论应用而已。

我想强调的是,朱骅关于后殖民文化及东方主义话语的研究有着一位中国本土汉语学者坚定持有的立场。他在这部专著的书写中试图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域,从美国的中国观演变中归纳出美国东方主义的五种国别特征,并以提取关键词的方式分章论述。此五种特征分别为:“东方”概念的独特性、恩扶主义(paternalism)的话语策略、传教士文本的广泛影响、内部殖民主义的历史框架、社会科学性

与大众娱乐性并举。

归总起来,除了第一特征“东方概念的独特性”是赛义德所提出的之外,其他四种特征都是作者在广泛集纳源语文献与语际细读的思考中所给出的理论表达。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东方主义的每一种特征,这部著作并没有止于简单的归纳与描述,而是以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集纳了丰富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和相关史料文献,以此在源语的书写语境中追根溯源,把每种特征铸成的文化元素逻辑化,从而剖析其特征在美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进而论述其在大众文化想象中所发生的作用。浓缩成关键词的逻辑概括突出了中国学者的思考立场与文化身份的学术表达。这种把阅读与思考直接投入于源语文献,然后给出一位中国学者的表达,是中国汉语学界进一步讨论后殖民文化的重要视域与立场。

对于赛珍珠置身其中的美国文化传统所生成的“中国话语”,这部著作更侧重于历史性的梳理。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这里所给出的历史性梳理,在逻辑上又与第一章所归纳的美国东方主义特点形成了有效的前后呼应,这种呼应形成了思考与书写的理论张力,这种理论张力在研究的思考中呈现为以下五个论述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奢侈舶来品、装饰艺术与文化精英的中国话语”,分析这一话语类型如何延续了欧洲18世纪的“汉风”(chinoiserie)式贵族东方主义话语传统;第二部分诠释了与美国内部殖民主义对应的“移民、大众文化与种族主义的中国话语”;第三部分论述了与传教士文本的广泛影响对应的“传教士、业余人类学与道德化的中国话语”;第四部分阐述了与美国东方主义的社会科学性对应的“冷战、区域研究与中国学的中国话语”;第五部分解析了与美国东方主义的大众文化性相对应的“离散、越界与跨国书写的中国话语”,并归纳地概括了上述提及的中美跨国书写中的四种类型以及对中国话语形成的影响;作为总结,这一部分还专门概述了赛珍珠在美国东方主义语境下的特殊位置,突出了这一研究在命题与论证两个面相上成立的必要性、逻辑性与合法性。

上述论述构成了这部著作的研究框架及学术语境,其中作者对西方源语学术文献占有的翔实与全面,使这部著作坚持的研究立场

与研究结论呈现出很强的历史性和说服力。

在这里,我特别想陈述这样一种曾经持久发生过的学术现象。近20年来,中国汉语学界关于后殖民文化研究的讨论,大多是中国学者据守汉语本土在批评的价值取向上所达向的一厢情愿,即中国本土学者在汉语译入语的后殖民文化研究读本中提取文化批评策略,以指向自己所批评的客体,这种研究方法论至少构成了以下四种类型的个案研究。

第一,关于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理论,这是作为“西方话语”借助于翻译而旅行到中国学界的。此后,中国学者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学者的后尘,在中国本土操用着汉语的思考与书写,隔靴搔痒地也把欧洲、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逐步地在地域空间上放大而假想为文化中心主义,并给予理论上的批判与抵抗。

然而,赛义德们的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在此被忽略了。在美国本土获取教职的赛义德们首先是不失时机地贴上第三世界学者之边缘文化身份的标签,然后,他们敢于带着嘲讽与仇恨的心态去批判、抵抗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及整个西方文化;而同期美国的华人学者更多地是为生存而绞尽脑汁,面对美国学界隐忍而谦恭。为什么华人学者在美国永远不能成为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同样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他们的期待、心态与胆识实在不一样。

第二,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化通过国际性的渠道合法化地进入中国本土后,一体化为中国大众消费领域的诸种文化产品,并且弥漫为一种社会时尚及时代精神。20年来,中国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对这种社会时尚与时代精神给予了文化上的批判与抵抗。

其实就我个人来看,这种文化上的批判与抵抗充其量也就是在国内汉语学术圈内发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国内大众对后现代西方文化及其产品的消费一定以无视学界关于后殖民文化的研究为自我享受的;并且在国民公共的社会身份上,后殖民文化研究者在本质上也是接受与享受后现代西方文化的大众,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与享用比他们所批判的“后现代文化的媚俗性”还要俗不可耐。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本土文学艺术家为了在西方获大奖,为

了抓取西方文学艺术评判者的眼球,讨好地向西方販售中国的仿民俗以赚取自己的国际名声,载誉归国后好在本土的同行与大众面前显摆一把。

这一类型的后殖民文化研究成为过去 20 年来国内比较文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诸多学者抓取的个案。特别让人痛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等在灵魂与荣誉上似乎全无自信心,难道中国人只有在西方获取了什么奖项,或者被西方同行在语际的误读中有意无意地认可了一下,才能够让自己面对着西方人时把卑躬屈节的腰稍稍挺直一点,从此返归本土后面对着自己的同胞毫无理由地傲慢起来?不错,21 世纪全球化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企业与高校等评估标准是依据西方的策略设定的,21 世纪全球化时期的中国人,其自信心与人格也更多的是依凭西方人确立起来的。

第四,后殖民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化的国际性现象,因为在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后沉落着诸种文化心态。关于中国汉语学界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其一度又成为部分中国本土学者抵抗文化西方而形成自身新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话语。

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启用抵抗“文化西方”这个表达,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部分中国学者对西方的后现代高科技物质产品的接受与享用是从肉体到物质的心悦诚服。尽管如此,他们却在学术精神的层面上宁愿把“文化西方”视为异教文化、文化暴力及文化中心主义,然后让自己颠沛流离在自我假想的受动性文化施暴状态中,奋起呐喊且抵抗什么的。尤其是对从事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新保守主义者而言,倘若他们一旦失去了对西方“异教文化”的抵抗性,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在假想的文化抵抗中所营构的学术生存境遇。学术的生存要求他们必须在出版界与新媒体上刻意制造出偏激,从而让人难以忘却自己的话语。

注意,我们在这里启用“异教文化”这个术语言指“文化西方”,这是较之于后现代时期中国的儒教文化崛起而言的。我们无法忘却的是,在“五四”与“文革”中,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曾两次打倒孔家店,但最具反讽的是,近 20 年来,儒家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却

被放大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形象,其不仅在国内被大众媒体作过度诠释的讲唱,成为一种对大众媚俗的普世价值观,并且,儒家文化传统及其精神也被放大为国教推向全球,大有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伦理之势。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国际现象,在西方后现代工业文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儒教也终于迎来了自己走向全球化的机遇。

客观地讲,也是总而言之地讲,后殖民文化研究在其批评话语的构成上并没有多少理论深度,这套批评话语所操用的基本理论策略无非就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03—2004)解构主义理论的皮毛,并且,也仅是把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理论的构成上简化为“中心与边缘”、“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价值替换而已。这一曾经持久发生过的研究现象——“后殖民文化研究”,最终似乎降解为中国学界那些耐不住坐冷板凳又想借文化批评在短期出名的人才去干的事;说得调侃些,就一批本没有学问的人做着本应该有学问的事。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绝然不再介入这个领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据我了解,后殖民文化研究应该也必然可以作出学养厚重的国际性学问来,其不应该仅是一种当代文化批评炒作的噱头。我们不妨去重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及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与霍米·巴巴等学者的著作,反思一下在后殖民文化研究这方领域中,我们还可以作出哪些更有国际性学养的课题研究。我想说的是,作者关于双语的中美跨国书写的系统研究,在心态与视域上的确没有再度重复上述现象;并且,作者是在后殖民文化研究经历过炒作后的寂寞时段,为汉语本土的后殖民文化研究拓出一条更为准确且厚重的研究路径。

当然在这里,我也希望给作者一些建议。由于这部著作在出版的字数上受限,所以作者关于美国东方主义的归纳在理论上显得有些单薄,尽管作者就具体作家作品已经给出了细读式的文本分析,但是,我还是希望作者能够立足于一个更为思辨性的后殖民理论高度,对这个课题给出大体系构成的历史逻辑分析,因为后殖民文化研究

所操用的批评策略是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是从语言分析哲学等的高度,对一统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及其文化传统进行理论上的拆解与颠覆。好像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解构性思考中,面对着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以来的文字书写历史在玩弄语言游戏,其实,解构主义哲学在思辨性与逻辑性上呈现出一种以语言暴力破坏语言暴力的理论强悍。这种理论的强悍,应该是任何一位从事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努力达向与接近的。

我想,作者在其后续的后殖民文化研究中一定能够达向与接近这一点。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 1899—1986)在其《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中把文学研究界分为三个层面: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准确地讲,文学理论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层面,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的逻辑总结,理论是一位研究者在其自洽的体系构成中不可遏制地呈现出来的人格力量与思想魅力,当然,对那些缺乏思想的研究者来说,理论就是让他们在学术生存的境遇中不知所措的暴力。我认为,一位恰切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在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三个层面上拥有一种整合的学养。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博士,作者在学科意识上是自觉的,作者在著作的起始处详尽地设立了一个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构架,然后,接续在前述的构架内推动具体的跨国书写文本的研究,并且,他的研究以六种话语型作为专题展开。关于话语型的顺序设置与分析策略的选择,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立场。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这里给出一个浓缩性的评述。

首先,针对中国学界普遍褒扬的关于赛珍珠的田园化中国书写,作者以“乡土中国与美国东方主义的审美话语”为标题,将一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域投向美国重农主义的历史传承问题,同时,也把自己的思考带入19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现代性的怀旧语境中,揭示了田园化中国书写中隐含的美学暴力及对帝国主义的怀旧。作者颇具见解之处在于策略性地择取了对乡土中国进行共时性

书写的中国作家鲁迅,以此与赛珍珠的书写进行互照与互视,并运用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的社会学、史学以及经济学数据,揭示了赛珍珠作品中常常被忽略的、隐伏的东方主义倾向。这种跨学科史料与经济学数据的引入是作者沉入这一课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的研究特色。说到底,从事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学者大都是介入式的知识分子。

其次,中国学界对于赛珍珠的中国书写一直持续性地给予褒扬性的评价,其原因在于某些学者认定她书写的中国人形象似乎具有某种普世性魅力,如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在《寻找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一书中曾给出如此的评价:“赛珍珠的中国农民,他们那坚忍的尊严、不懈的耐力、内在的现实精神和他们与无情的自然不断的斗争,深深地打动了美国人民的心灵。”^①史景迁的评价是针对 20 世纪 30 年代承载负面价值的中国形象而给出的。朱骅的著作为了在理解与解释的深度性上准确把握赛珍珠书写的中国,特别梳理了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形塑于美国文学和大众文化中的中国人形象,同时,也检讨了生产这种形象的异类化、漫画化等话语策略。建基于此,作者以“类民族志书写与中国形象话语转型”为题,从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策略的角度,指出赛珍珠在书写中国人形象时对读者的阅读趣味的良好把握,有意无意地使用民族志的书写路数,如对原始而封闭的小型社区的选择、白人作者隐身的零度书写、平实化语言风格的使用等。也就是说,在汉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形成时,同时,在美中关系的发展所激发的读者对中国的兴趣无法得到科学化的满足时,《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等小说必然获有了民族志的科学性魅力,并以此推动读者产生了假性达向历史本体的幻觉效应。置换一个视点来诠释,这种拟真性阅读实际上否定了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学理的层面上透视,这种拟真性阅读在幻觉效应中将中国推置于前现代,其与田园化的中国书写同属东方主义思维的逻辑脉络。

^①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 387.

再次,为了进一步揭示赛珍珠的中国书写在美国本土获取西方读者轰动效应的文化机制,这部著作还以“叙事美学的大众性与反贵族东方主义”为题,以赛珍珠荣获诺贝尔奖所发表的演说《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 1938)为切入点,解释了赛珍珠中国书写内含的平民化叙事美学。赛珍珠的草根认同思想和她的乡土化中国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她所选择的草根立场与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共谋,策略性地巩固了她言说和书写中国文化的权威性。赛珍珠曾与江亢虎等代表中国贵族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过论战,并且,赛珍珠以其中国书写对林语堂、宋美龄等华人知识分子给出一个他者视域的评论,而正是上述的论战与评论进一步加强了赛珍珠代言中国最为广大的农民群体的权威性。

实际上,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借用法国比较文学教授巴柔(D. H. Pageaux, 1939—)的调侃来说,比较文学幸亏什么也不比较,比较文学在视域上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方宽阔的国际性文学研究平台^①。赛珍珠所坚持的中国式小说创作,其中不可遏制地融合了美国女性小说的写作手法,在叙事话语中,这种写作手法的跨界性介入,消解了西方本土读者可能遭遇到的异质文化价值观的挑战,也因此可在接受性的阅读心理中,西方本土读者进一步地体验到了符号化的异质文化给他们带来的阅读乐趣。

需要提及的是,这部著作在对赛珍珠的中国乡土书写作了上述详细的分析之后,更跨越了中美两国学界关于赛珍珠研究一贯性关注的讨论,开始触及众多学者所忌讳的话题。

赛珍珠作为一位来华的新教女传教士,美国的“中国话语”传统及其在地性渗透与教化式影响,对她的信仰立场与文化身份之构成已经彻底本质主义化了。虽然《大地》让她在跨国书写中收获了国际性声誉,但是,她也体验到了中国正在走向现代性的节律已铸成了不

① 按:关于巴柔教授的这个表述请参见《比较文学概论》:“1977年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学院院长巴柔(D. H. Pageaux)在北京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时,有的学者提问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巴柔以一种诙谐陈述出一位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地道的职业感觉:我们什么也不比较,幸亏我们什么也不比较。”(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